

万卷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

第2版

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 道格拉斯·艾子 著

郑显兰 等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责任编辑：雷少波

封面设计：陈思宏



zhixing yanjiu fangfa jiankang ji xiangguan zhuan ye yanjiu zhinan

ISBN 978-7-5624-4720-7



9 787562 447207 >

定价：49.00元

万卷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

第2版

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 道格拉斯·艾子 著
郑显兰 王虹 蒋小平 周小利
孟玉倩 付艳芬 贺启莲 李双子
陈新红 崔瑾 蒋林俊 王玮 王秋鸿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Pranee Liamputton And Douglas Ezzy, 2005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第2版)原版是于2005年出版的英文版,该中文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并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销售。
版贸核渝字(2008)第0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澳)利亚姆帕特唐
(Liamputton, P.), (澳)艾子(Ezzy, D.)著;郑显兰等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1

(万卷方法)

ISBN 978-7-5624-4720-7

I. 质… II. ①利…②艾…③郑… III. 公共卫生—研究
方法—指南 IV. R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739 号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 道格拉斯·艾子 著

郑显兰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罗 杉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贾 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 字数:383千 插页:16 开2页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720-7 定价:4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万卷方法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

- 黄希庭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沈崇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劳凯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学术委员(以下按姓氏拼音排序)

- 陈向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蓝 石 美国 DeVry 大学教授
廖福挺 美国伊利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 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 欣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马 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邱泽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夏传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熊秉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小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作译者简介

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Pranee Liamputtong)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La Trobe)大学公共卫生学校的副教授,执教于社会学和人种学学院,并在大学下属的母婴健康研究中心做过研究员。普拉尼对文化与社会对怀孕、生育和性健康的影响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并已在相关领域发表了几部著作及多篇文章。她所著的三部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在健康领域广为应用:《我的40天:一本供健康专业人员提供生育服务的跨文化资源的书》(*My 40 Days: A Cross-Cultural Resource Book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in Birthing Services*);《亚洲母亲,澳洲生产》(*Asian Mothers, Australian Birth*);《在澳洲的亚洲社团的产妇和生育健康》(*Maternit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Asian Societies*)(与 Lenore Manderson 合著)。

道格拉斯·艾子(Douglas Ezzy) 霍巴特的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院的资深研究人员。之前他曾任教于拉特罗布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种学学院,并且是该大学国家 HIV 社会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这个中心是研究性传播疾病的机构。道格拉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个体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构建。道格拉斯一直潜心于 HIV/AIDS、精神卫生、工作和失业的社会学及宗教等的研究。他的文章发表在下述期刊上:《社会科学和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艾滋病的护理》(*AIDS Care*)、《质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社会学》(*Sociology*)以及《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叙述失业》(*Narrating Unemployment*)(2001)、《质性分析:实践与创新》(*Qualitative Analysi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2002、2003)以及《实践女巫的骗术》(*Practising the Witch's Craft*)(2003)。

郑显兰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护理部主任。她的社会兼职有: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重庆市护理学会副理事长,以及《中华护理杂志》《中国护理管理》《中国循证儿科杂志》编委等。她主编出版的《现代儿科护理手册》获2001年度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并曾分别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进行为期2年和6个月的培训和访学活动。近年来,她先后出席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瑞典、墨西哥、希腊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其在会上做的口头发言获得各方专家的好评,为国际医护界人士认识我国的护理研究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

译者的话

200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蒙纳士医学中心图书馆,我找到了由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和道格拉斯·艾子主编的《质性研究方法》第2版,两周的借阅期内,我读完了它。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禁感叹,居然有人能将工具书写得如此生动、灵性和人性化!而在我的脑海里,工具书一直都是严肃的、死板的、冷冰冰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性教科书。在写作风格上,对质性研究初学者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在内容上,它适合所有热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那些有志于改变自然科学的表达方式的研究者。所以,我决定将它翻译出来呈献给中国的读者和学者。在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该书的翻译权。

于是,我开始了 I 未能预料的艰苦的翻译历程。由于工作繁忙,我只能利用零星的休息时间来进 I 行翻译工作。翻译中,我一方面折服于原著语言的优美,而另一方面又为如何将其转换成同样优美的中文而困惑。因此,可以说是怀着既兴奋又痛苦,同时还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我认为自己无力以“译者前言”的方式来反映该书的概貌,所以借原著中引用罗奇(Roach, 1990)的一首诗,请读者遐想并从书中寻找你想要的信息:

艾伯特·纳马特吉里所画的

并不是他所看到的

而是他内心所感到的

以及他对弗林德斯山脉有多么深的爱

最后,感谢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肖东霞博士对第1章的审校工作;感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杨锡强教授对第13章和第14章的审校工作;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将此书纳入“万卷方法”出版计划,使其能在一个极好的平台上与读者交流;感谢本书编辑雷少波先生为本书的策划、编辑、出版所做的努力;最后感谢毫无怨言地做着后勤保障和精神支持的丈夫钟敏先生。可以说,该书的翻译是上述人员组成的团队工作的成果,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翻译必有疏漏。敬请读者电邮 zhengXL003@163.com, 惠赐批评和指正。

郑显兰

2008年8月于重庆

第 1 版前言

本书主要是为揭开质性研究,尤其是质性健康研究的神秘性而作。我们写作的这本教材,既包含对质性研究的实践性指导,又有对一些重要事件的理论性讨论。本书的目的是使那些着手从事质性研究的研究者通过努力,能完成从拟订方案、实施研究、分析结果到写出并出版报告的全过程。

在 20 世纪,生物医学取得了很多显著成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在疾病和健康方面的体验。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还有很多基本的问题不能单用生物医学来解决,因为从根本上讲,很多后现代社会的健康问题是关于意义和诠释的问题。例如,虽然我们在生物医学方面不断提高,我们已经理解了艾滋病在生物医学上是如何传播的,但因为社会的因素,因为很少的人能理解他们行为的后果,以及政府总是不情愿或者是在如何应对危机时很困惑,所以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至今仍然与人类为伴。

质性研究方法的焦点是揭示和诠释事物本意,它们提供一个老到的研究策略以让读者理解人们怎样,以及为什么采取一种特别的行动方式。再者,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提供重要的政策方向,以及对某些重要政策含意的细节的理解。质性研究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容易的选择,或者是作为对“硬的”统计学研究方法的辅助或先驱方法。然而,我们以为质性研究方法有其特有的重要性,它能使研究者开始涉入在情感、政治以及技术方面都极具挑战的意义的复杂性,那些对文化、多元文化、全球文化的复杂含义的理解和解释的挑战,正是当前现代健康领域争论的中心。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满足知识覆盖面广泛的公共卫生实践在 21 世纪的发展需要。

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出版。我们要特别感谢艾伦·凯莱赫(Allan Kellehear),是他一直相信我们的工作,并鼓励我们写这本书。普拉尼要感谢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博士,他阅读了很多章节。感谢苏珊娜·伊迈姆(Susanha Yimyan)副教授,她从一开始就帮助普拉尼处理技术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资料管理和最终将所有章节排入此书。道格拉斯也要特别感谢桑迪·吉福德(Sandy Gifford),是她鼓励道格拉斯继续从事质性研究教学。

我们要感谢吉尔·莱恩(Jill Lane)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对此书的发表所做出的奉献,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使我们的书得以出版。

感谢以下的作者和出版者授权我们使用其作品:

D. Karp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for extracts from *Speaking of Sadness*, 1996; Trinh T. Minh-Ha and Routledge for extracts from *When the Moon Wa-*

IV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xes Red, 1991; Blackwell Publishers for extracts from J. Kitzinger, 'The Methodology of Focus Group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vol. 16, no. 1, 1994; Harper & Row for extracts from E. L. Webb et al., *Unobtrusive Measures*, 1966; Elsevier Science for extracts from P. Clark and A. Bowling, 'Quality of Everyday Life in Long Stay Institutions for the Elderly.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Long Stay Hospitals and Nursing Home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Elsevier Science, fro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30, no. 11, pp. 1201-10, © 1990, and from D. L. Klinman and L. J. Cohen, 'The Decontextualisation of Mental Illness: The Portrayal of Work in Psychiatric Drug Advertisement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Elsevier Science, fro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32, no. 8, pp. 867-74, © 1991; Verso, London, for extracts from F. Haug, *Female Sexualization*, 1987;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for extracts from S. Kippax, 'Memory Work', in J. Daly and E. Willis (ed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ealth Research*, 1990; M. Hammersley and P. Atkinson and Routledge for extracts from *Ethnography*, 1995;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extracts from R. A. Hahn, 'Divisions of Labour',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1, no. 3, 1987; Dr Muhammad Anisur Rahman and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People's Self-Development*, 1993; Professor Mildred Blaxter for extracts from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apers', *Medical Sociology News*, vol. 22, no. 1, supplementary, 1996; John Wiley & Sons, Inc., for extracts from R. Bogdan and S. J. Taylor,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1975. Excerpts from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by James P. Spradley, © 1979 b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第2版前言

首先我得承认：自从我和道格拉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第1版后，我就着手收集新版的资料了，因为我知道很快我就会写第2版。确实如此，出版商德布拉·詹姆斯(Debra James)现在就请我们写第2版。收集了那么多的资料，现在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要在这第2版中写些什么呢？

从第1版发行以后，关于质性研究的书有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由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写的。虽然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在沿用，但这些年来，我看到质性研究所引起的健康领域的变化，因此，我增加了一些质性研究的新趋势，特别是增加了三个新章节，使得这本书更加全面。这些新章节中包括一章对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群体的研究方法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敏感地、合伦理地及有效地进行此类研究。我相信，在目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研究者要想避免研究这些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些人群很可能面临更多的健康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在新版书中，我还写了一章使用网络传媒交流作为研究工具的内容。网络交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借助它更快、更容易地联系。因为这些优势，网络传媒已经被用作一种研究工具。我相信，网络研究将在很多方面促进质性研究。

最后一个新章节，也是这次再版的结论部分，我提出，作为研究者，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发表研究发现时选用不同的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代表研究参与者的声音。我相信，这将会在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方面非常重要。

在其他所有的章节里，我从最近的出版资料中收集了更多的例子和参考文献，并且，在有些章节里，还加入了一些新的讨论，例如，在第12章的资料分析中，我列举了另一种有趣的资料分析方法——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我认为本书再版呈现的是一种全面的、最新的、对质性研究者和学习质性研究的学生很有价值的内容。

读者对本书第1版的美好评价之一是它的易解和易读。在书中我们用简单的语言进行写作，并举出足够的例证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在第2版中，我依然沿用了这个传统。我希望和你分享最近我和爱丽斯的交流，她住在很远的地方，幸运的是我们还是见了面。爱丽斯是为了逃避她的国家的政治迫害而来到加拿大定居和工作的移民妇女。我们是最近在加拿大召开的关于质性健康研究的会议上见面的。我们讨论了一些研究方法，她知道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质性健康研究方法方面的

书,她说她要订购这本书,结果她真的订购了。最近,我收到了她的一封电子邮件,下面就是她在信中所说的(经过爱丽斯同意才印出来的):

亲爱的普拉尼,

您好!我希望您记得我,我们最近在加拿大的会议上见过面,并有过简短的交流。很高兴有机会认识您!我觉得自己好幸运,认识了一位曾经写作了《质性研究方法》这本精彩著作的如此了不起的人。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书,它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也很基础、简单,像我这样对质性研究很陌生的人也能够理解。

我曾经上过质性研究的课程,并且找到并阅读了一些关于质性研究和参与行动研究的书籍和文章。在您的书里,我很高兴,也很惊讶地发现,你推荐了很多在质性健康研究方面的有用的书籍。我在其他书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推荐。您提供给读者的书目对于像我这样对这种研究方法还是个新手的人来说非常有用。我喜欢这本书的每一部分。请保持联系,如果有这本书的新版出来一定记得告诉我。

爱丽斯

非常高兴从一个你刚刚遇到过的人那儿听到这种评价,很多其他学生和正在开始质性研究的入门研究者对爱丽斯的评价也有同感。

不幸的是,由于个人原因,道格拉斯·艾子无法在第2版中继续奉献,但是,因为在第1版中的贡献,他仍然是合著者(他在第1版中单独著作的章节包括第1,2,3,6,10章,简介和结论章节的部分内容)。

和其他书一样,要是没有其他人的帮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发表。在此,我特别希望表达对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德布拉·詹姆斯(Debra James)和露西·麦克洛克林(Lucy McLoughlin)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迟交稿所给予的坚持与耐心。和其他工作在大学的教师一样,我也不得不做很多教学工作。繁重的任务缠身,还得写作一本书,并且要按时交稿,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做到了。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两难处境的理解[我的女儿佐薇(Zoe)和(埃玛)Emma以及大卫]。我要诚恳地感谢罗斯玛丽·奥克斯(Rosemary Oakes),是她为我耐心地阅读和编辑这些新的章节。我同样要感谢黛安娜·伯恩(Diane Bourne)和薇姬·特沙纳克思(Vicki Tsianakas),我的好朋友们,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

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

2004年7月,墨尔本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质性研究的背景

第 1 章 质性研究相关理论:传统与创新	9
质性研究的首要问题	10
实证主义	11
民族志	12
现象学	13
符号互动论	15
女性主义	16
后现代主义	18
诠释学	22
结 论	23
第 2 章 严谨、伦理与抽样	25
理论方法的严谨性	26
确保严谨的技巧	30
质性研究的抽样策略	35
理论抽样	40
结 论	41

第二部分 质性研究方法的类型

第 3 章 深度访谈	43
什么是深度访谈	44
访谈的艺术性	46
访谈技巧	48

措辞“问题”	49
构建主题目录	49
探 查	50
访谈的管理	52
访谈录音	53
转录访谈	54
深度访谈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54
结 论	57
第 4 章 焦点团体	60
什么是焦点团体访谈	61
焦点团体的历史	62
为什么使用焦点团体	63
焦点团体作为方法	64
焦点团体的相互作用	65
参与者	66
多少个访谈小组,多少个参与者才足够	69
怎样招募参与者	70
奖励措施	71
协调员	72
记录员	73
记录小组讨论内容	73
焦点团体访谈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73
成功的焦点团体访谈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76
结 论	79
第 5 章 非干预性研究方法	81
什么是非干预性研究法	82
为什么要运用非干预性研究法	83
非干预性研究法的历史	84
非干预性研究法作为一种方法	85
非干预性研究法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91
什么决定非干预性研究的好质量	98
结 论	99
第 6 章 叙事分析与人生历程	101
为何使用叙事分析	102
叙事是什么	105
叙事导向访谈	106
叙事分析的类型	107

政治、伦理和叙事分析	108
生活史与叙事分析	109
叙事分析在健康与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110
结 论	113
第 7 章 回忆工作	115
回忆工作是什么	116
为什么应用回忆工作	118
回忆工作的历史	119
回忆工作作为一种方法	120
回忆工作:过程	123
回忆工作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124
回忆工作资料能被归纳吗	128
回忆工作成功的决定因素	128
结 论	130
第 8 章 民族志	132
什么是民族志	133
民族志能做什么	134
民族志的历史	135
民族志学者	136
作为方法的民族志	137
民族志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144
结 论	147
第 9 章 参与行动研究	149
什么是参与行动研究	150
为什么采用参与行动研究	151
参与行动研究及行动研究	152
参与行动研究的历史	152
理论视角	153
作为一种方法的参与行动研究	155
参与行动研究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157
什么决定参与行动的质量	161
结 论	163

第三部分 质性研究的应用

第 10 章 对易受伤害人群的研究	165
易受伤害人群和敏感性问题的研究	166

资料收集的恰当方法	167
程序的敏感性	173
结 论	185
第 11 章 在线:在网络空间做质性研究	187
在 线	188
在线研究提供什么:在线研究的利和弊	190
访问在线参与者的方法:一些实践的考虑	195
网络空间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197
在网络空间的研究:方法和例子	202
结 论	209
第 12 章 理解质性资料:分析过程	211
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	212
第一步:识别分析的单元	213
内容分析	213
话语分析	214
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217
扎根理论或主题分析	218
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	225
伦理、政治和质性资料分析	232
第 13 章 质性研究计划书的撰写	234
什么是研究计划书	235
研究计划书的结构	236
撰写过程	244
一份成功研究计划的决定因素	245
结 论	249
第 14 章 质性研究论文的写作	251
质性研究论文写作的特点	252
读者是谁	253
质性研究论文的组织结构	254
好作品:寻找什么	257
发 表	258
质性研究类论文的评判标准	261
结 论	263
第 15 章 结论——新方向	264
结束语	270
术语表	271
参考文献	275

绪 论

质性研究培养人类最有用的能力——向他人学习的能力。(Patton, 2002, p. 1)

如同大教堂内所呈现的众多的希腊悲剧作品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等人类在精神方面的杰作一样,理解是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完整的艺术作品。人类建构意义就像蜘蛛结网,或者某些酶合成蛋白质一样。(Mary Catherine Bateson, 1994. 见: Ely, et al. 1997, p. 63)

质性研究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使我们从生活中及我们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学到更多的东西。(Marriam and Associates, 2002, p. xv)

质性研究是什么

撰写关于指导质性研究的书就如撰写关于指导诗歌创作的书一样。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规则和惯例,也有一些应被避免的缺陷以及值得研习的好的例子。然而,归根到底,最好的质性研究依赖于研究者本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研究者必须去发现在具体、实在的研究领域里进行意义和诠释的构建的最好途径。

一般而言,质性研究是以解释现象为导向的,其研究焦点是构建和维持有意义的、复杂的、有微小差别的过程。质性研究的目的是引出经历和行为的脉络化的本质,并试图对其进行精细的、深度的和综合性的(在相关的个体事件意义及更大的意义系统和模式的解释方面)分析。然而,质性研究不能被认为是所有情况都实用的理论和技术。恰当地讲,质性研究要依赖于多种理论观点和实用技术,理论方面包括现象学、符号互动论、文化研究、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技术方法包括访谈、叙事分析、民族志、焦点团体等(Denzin and Lincoln, 2000a; Merriam and Associates, 2002; Seale et al., 2004)。尽管质性资料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科学,其基本目的“都是捕获人的社会生活经历以及人们基于自己的观点对这些经历的解释”(Corti and Thompson 2004, p. 326)。

质性研究比量化的统计学方法更具灵活性和连续性,有人认为这一特点使得质性研究无明确的规则监控,所以其价值较小。实证主义研究者认为质性资料的解释性的本质使其成为“软”科学,缺乏信度和效度,总体上对于科学知识,尤其是卫生保健科学知识毫无价值(Baum, 1995; Denzin and Lincoln, 2000a; Guba and Lincoln, 1994)。

但是,由于质性研究聚焦于意义和解释,其弹性的、解释性的方法是必要的(Liamputtong Rice, 1996a)。根据哈默斯利(Hammersley, 1992a, p. 45)的观点,质性资料是可信赖的,因为其“所记录的世界来自于被研究人群的观点,而不是研究者的观点”。大多数质性研究假定,为了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尽力理解行为者对其行为所赋予的意义和所做的解释。不像流行性疾病的测量或临床测试结果,质性研究的意义和解释不能使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测试和处理。质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如比喻、意义和解释要求更加灵活,但不乏严谨。

例如,心理学研究显示失业人员比在职人员更易发生抑郁症(Winefield et al., 1993)。统计学以最好的方法证明了失业与抑郁之间的相关性。然而,当研究者们试图找出为什么失业者产生抑郁时,除了发现失业的年轻人倾向于看更多电视外,则无更多发现(Winefield et al., 1993)。对该问题的研究从以前寻找就业状况与不同心理测量的关系,改变到寻找失业人员构建人生价值的方式。然而,研究者们仍然继续沿用无法做出解释的量化研究方法。

正如西布鲁克(Seabrook, 1982)所注意到的那样:年轻的失业者看电视仅仅是表象,而事实是失业者生活在需要花钱买消费品(就像电视广告呈现的那样)以使

其参加社交活动时感到舒适自在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你没有能力买饮料或你没有合适的穿着,与朋友一起到酒吧或夜总会是非常尴尬的事。从电视上观看朋友到酒吧或观看酒饮料广告只能强化失业人员与社会脱离。失业导致与社会隔离、看电视,以及抑郁。把失业人员的抑郁归因于看电视是错误的,看电视并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对年轻失业者把时间花在看电视上的背后原因做出解释才能找到产生问题的真相。就像西布鲁克所做的那样,只有用质性研究方法,才能描述看电视能强化年轻失业者与社会隔离和抑郁的过程的解释。

有些人特别擅长量化研究,他们似乎喜欢统计学。我的一位同事就是一位杰出的量化研究者。他把阅读统计学作为一种消遣。业余时间,他专注于与特定统计程序有关的数学,使用笔和纸进行演算,直到彻底理解其中的奥妙。他显然是对这方面很欣赏。虽然我们羡慕他,但当我们已经知道了怎样做奇数因子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时,我们并未效仿他的行为。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对质性研究感兴趣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同样地,若要将质性分析的某部分放在计算机上,你可想象得到会有人事先进行手工分析以至彻底理解其程序。也有详细描述质性研究技术的教科书(Cresswell, 1997; Flick, 2002; Marshall and Rossman, 1998; Maxwell, 1996; Ritchie and Lewis, 2003; Rossman and Rallis, 2003; Silverman, 2004; Strauss and Corbin, 1998),你可以想象,有人会以阅读这些书为乐。你也可以想象有人研究各种深奥的逻辑以寻求具有分析质性资料能力的程序。然而,尽管质性资料分析技术很重要,但一个只对技术着迷的人已经失去了对质性研究要领的理解。

与我们那位以统计技术为乐的同事相对应,质性研究者是以理解别人为乐。在此说明,并不仅仅是统计比较研究主题意义的区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的区别。人以及他们赋予事物的意义,不能像问卷调查结果那样可以用统计学方法通过标准技术检验,因为用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常常忽略了对意义的解读过程。另一方面,质性研究方法将意义解读过程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解读过程指的是人们解读并诠释事件和事物的过程。

戴维·卡普(Karp, 1996)对抑郁的感人研究为我们在好的质性研究及其背后的动机两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当他被家人和朋友问到关于他正在从事的研究时,他通常会这样回答:

我对解释抑郁的形成原因和怎样治好它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相反,我对以下问题感兴趣:即抑郁者如何理解生活环境中固有的含糊?随着时间推移,抑郁者怎样打开思路?人们怎样看待精神病学和药物治疗?以及怎样处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Karp, 1996, p. 189)

卡普对解读过程感兴趣,他对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以及如何诠释抑郁的意义感兴趣。

说到解读过程不能用标准技术检测,但也不要将这一点推向另一个极端。我

4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的一位同事曾经听说过一个不知是否真实的故事,一位美国顶级的质性研究人员,每当新学生分配给他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问他们研究时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们仅仅回答“疾病”,而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更多的话题讨论、没有对方法学或研究目标加以说明,他会送他们到诸如医院这样的地方去开始他们的经验性的观察。我们怀疑这个故事被夸大其词了,但是,它的教育意义值得深思。虽然统计学分析的标准技术不能用于质性研究,但有很多的方法、程序和实践可作为质性研究的部分被系统地考虑和计划。除了要求有创造力和创新性外,还要有严谨性、一致性和完整性。仔细研究和回顾现已存在的有关质性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是从事质性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罗斯曼和罗尔斯(Rossman and Rallis, 2003, p. 8-9)将质性研究的普遍特征总结如下:

- 发生在自然状态(it takes place in the natural world)
- 聚焦在事情的背景(it focuses on context)
- 使用多种方法(it makes use of multiple methods)
- 它是自然显现的,而不是紧紧跟随预想的(it is emergent rather than tightly prefigured)
- 它是从根本意义上进行解读(it is fundamentally interpretive)

对于质性研究人员,他们的个性特征是:

- 能整体地理解社会(see the social world holistically)
- 对个人传记敏感(sensitive to personal biography)
- 能运用复杂的推理(employ complex reasoning)
- 系统地反思自己(systematically reflect on who they are)

为什么应用质性研究方法

在过去十年里,由于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被越来越多的健康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接受,社会科学家们已对应用质性方法解读各种卫生相关领域资料的价值进行过辩论(Baum, 1995; Daly et al., 1992; Holman, 1993; Rein, 2004; Yach, 1992)。鲍姆(Baum, 1995)在谈到质性方法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时说,质性方法“非常适合研究复杂的情形,并且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公共卫生研究。因为它注重描述和理解人们,质性研究方法特别贴切于新的公共卫生。质性方法对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经历能够提供深刻的见解,而其他的研究方法则不容易做到(请看案例:Campbell, 2002; Glassner and Herz, 1999; Lewis and Lindsay, 2000; Liamputtong Rice, 1996a, 1996b; Liamputtong Rice et al., 1994; Miller and Tewksbury, 2001; Reid, 2004)。在促进研究成果推广方面,质性方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杜尔和汉考克(Duhl and Hancock, 1988, p. 7)呼吁在城市卫生研究领域使用质性故事,因为

“只有数据变成故事才能够被所有人理解,否则,这些数据无论对政治或者行政当局的改革都是没有效果的”。

质性方法作为研究的探索阶段也经常是有用的。例如:麦克唐纳和戴利 (McDonald and Daly, 1992, p. 213) 断言:质性资料分析是必需的,尤其是当研究者对所探索的领域了解不多时,以及“对那些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方面,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量化统计数据在解释公共卫生问题时非常有用,特别是疾病的起因和发展,但这些数据可能蒙蔽人们的解读和理解,以及与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而质性研究资料“近几年来在允许人们对已成为公共卫生关注的背景话题的理解上更加有力”(Baum, 1995, p. 463)。在公共卫生领域,鲍姆认为质性信息能够用在以下三方面 (Baum, 1995, p. 464):

- 解释那些影响到健康和疾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
- 理解团体和个人如何自我解读健康和疾病。
- 研究与任何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不同参与者间的互动作用。

相似地,霍尔曼 (Holman, 1993) 认为,质性研究信息能够很好地用于慢性疾病的研究,他认为病人的观点“相对于普通医学方法更能预报疾病的预后,病人对以前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

质性研究资料也可以用来解释量化研究的结果,当人们在量表上填上数据时,其意义是很难被解释的,而质性研究就能够解读统计数据的意思。比如说,戴利和她的同事 (Daly and McDonald, 1992) 在诊断心脏病的常规检查中就提出,在医学领域存在很多无法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技术解决的问题。

很多健康照顾研究注重量化统计数据的产生 (Daly and McDonald, 1992)。但批评卫生研究看重量化数据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那些数据没有用处,量化研究数据的单独使用或者和质性研究资料的共同使用都能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然而,当我们讨论健康照顾领域的话题时,以人们的观点去理解他们对健康的重视和他们的经历至关重要。通过这种理解,我们才可能和人们一道更加准确、更加有效地工作。质性研究方法以及通过其解读所得到的资料是极其宝贵的,质性资料为科学理解的进步带来巨大利益,正如霍尔曼 (Holman, 1993, p. 33-35) 所说,揭示和调整个体生活秩序是良好的健康照顾所必需的。当质性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清楚地建立起来时,医学知识将会得到极大的加速发展。

质性研究中有用的书籍

本书提供了在质性研究中所要用到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是一本实用指南。该书特别关注于与健康相关的研究,据我们所知,至今为止,这使得本书显得独一无二。还有很多其他有用的书可供质性研究者们参考,每本书有不同的重点和用处。下面特推荐其中的四本:

登津和林肯 (Denzin and Lincoln, 2000a) 编撰的《定性研究(全4卷)》(*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①,西尔(Seale et al., 2004)最近所著的《质性研究实用指南》(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前者广集了关于质性研究的综述,注重理论、哲学和一些实践话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后者的很多章节是以“自传体”方式写作的,它使得这本书比其他理论方法的书更加“现实”。然而,它们没有涉及在健康照顾领域中采用这种研究策略的相关实践、政治和伦理话题。

科洪和凯莱赫(Colquhoun and Kellehear, 1993, 1996)编辑的《实用卫生研究》(Health Research in Practice)重点集中在目前的健康照顾方面的执业者之间的话题上。很多章节都对选择的研究方法和话题进行了详细、有用的讨论。然而,他们没有对各种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也没有强调对有待提高的研究者们的教育需求。

戴利、凯莱赫和格利克斯曼(Daly, Kellehear and Gliksman, 1997)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The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一书写得很好。就像题目所说,它主要满足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的需求。它特别提供了最近有关公共卫生方面所有的研究摘要。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在于:也许该书并不贴切于卫生领域的所有专业。

自从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许多质性研究书籍陆续被推出以供质性研究人员选择。例如: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An Introduction (Grbich, 1999), New Approaches in Social Research (Grbich,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Care (Pop and Mays, 2000), The Qualitative Inquiry Reader (Denzin and Lincoln,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Seale et al.,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Ritchie and Lewis, 2003),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Companion (Huberman and Miles, 2002),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Esterberg, 2002), A Compan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Flick et al., 2004), and Douglas Ezzy's book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Ezzy, 2002). Some of Denzin and Lincoln's first editions have turned into second editions. These include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003a),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2003b), and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003c).

我们也看见更多的质性调查在不同领域应用。例如,在社会学(Marvasti, 2004)、人文地理学(Hay, 2000)、临床科学与心理学(Camic et al., 2003; Cropley, 2002; McLeod, 2001; Smith, 2003)、康复(Hammell and Carpenter, 2004)、护理(Holloway and Wheeler, 2002; Streubert and Carpenter, 2002)、旅游(Phillimore and Goodson, 2004)、教育(Freebody, 2003)、信息系统(Myers and Avison, 2002; Trauth, 2001),以及营销(Ereaut et al., 2002; Mariampolski, 2001; Morrison et al., 2002; Sayre, 2001; Walle, 2001)。

^① 本书中文版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书籍,它们倾向于质性研究的特定形式,如民族志学(Atkinson et al., 2001; Brewer, 2000; De Laine, 1997; enzin, 1997, 2003; Fetterman, 1989, 1998; 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5; Taylor, 2002; Willis, 2000)、参与行动研究(De Koning and Martin, 1996; Reason and Bradbury, 2001; Wadsworth, 1991)、非干预性的方法(Kellehear, 1993a)、深度访谈(Gubrium of and Holstein, 2002, 2003; Holstein and Gubrium, 2003; Kvale, 1996; Minichiello et al., 1995; Wengraf, 2001)、焦点团体(Bloor et al., 2001; Dawson et al., 1993; Greenbaum, 1998, 2000; Krueger and Casey, 2000; Litosseliti, 2003; Morgan, 1997; Puchta and Potter, 2004; Vaughn et al., 1996),或者分析模式(Corbin and Strauss, 1990; Dey, 1993; Ezzy, 2002; Kelle, 1995; Krippendorff, 2004;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Neuendorf, 2002; Phillips and Hardy, 2002; Silverman, 2001; Tesch, 1990)。最近,我们还看见更多关于质性研究在不同领域实践的书(Darlington and Scott, 2002; Merriam and Associates, 2002; Padgett, 2004)。

关于作者

好的质性研究需要有从事质性研究的专门知识。虽然理论知识很重要、很有用,而解读真实生活如何过渡到通常理想化了的模式和诀窍的方法也是必需的。两位作者在健康研究中转向使用质性研究,因为我们发现质性研究方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工具。我们进行过大大小小的研究,这些研究教会了我们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做质性研究的知识,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能够检测当我们过去还是这种方法的新手时所阅读的课本。这些研究经历加深了我们应用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理解健康和疾病的有效模式的信心。另外,我们还经常接触到一些社区卫生中心、医院和卫生当局的健康研究员,他们希望在研究课题中使用质性方法,但是对这种方法没有实践技巧和知识。虽然,教学和研究在大学中是分开的,我们在这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兼顾教学和科研会收获更大。我们的个人研究经验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活力,而我们的教学经验也使我们能够在研究中提出更加清晰的问题。除了这些,我们都有教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经历,并从学生那儿学到很多,他们教我们的东西几乎和我们教他们的一样多。

关于这本书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质性研究方法的历史和哲学理论(第1章),包括民族志、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诠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第2章讨论研究的严谨性(我们更愿意将其表述为“信度和效度”)、各种取样的方法、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伦理和政治。

第二部分由七个章节组成,第3章到第9章描述一些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包

括深度访谈、焦点团体、非干预性的方法、叙事分析和生活史事件、回忆工作 (memory-work)、民族志,以及参与行动研究。尽管资料分析作为方法回顾的组成部分已被提及,但这些章节的重点是资料收集的方法。例如:叙事分析、回忆工作和参与行动研究。每一章节还提供了采用该方法所做的研究案例。

第三部分是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第 10 章讨论了有关研究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话题。在第 11 章里,我们提供了一种做质性研究的新的趋势——网络研究。第 12 章讨论的是资料分析过程,并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的回顾,和由计算机辅助分析派生的研究话题的概述。第 13 章评述了以申请研究基金为目的的质性研究计划书的写作。第 14 章是如何写作并发表文章,以及质性研究成果的评估和推广。最后我们讨论了在质性研究中表达研究参与者声音的新方法,我们还在这本书里纳入了质性研究的新的指导语。

正如您所预期的那样,本书的一部分对某些读者非常有用,而其他部分却未必有用。为使研究新手能够开始使用质性方法做研究,我们尽可能对各种方法都做介绍。同时,我们也为那些熟练使用本方法的研究者讨论一些更复杂的、更有创新的和更深入的方法。即使新手在短期内不需要用到这些方法,他们也应该关注这些方法。为此,我们在本书中提供了:

- 对质性研究方法范畴的一种实践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 借助实际案例,详细讨论每一种方法。
- 讨论在健康领域,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使用这种方法。
- 讨论在健康领域,内部和外部所受到的政治和伦理的影响和牵连。
- 讨论在期刊上发表的质性研究,以阐明质性方法在初级、中级以及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应用。
- 列举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例子,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争论焦点。
- 指导学生进行质性研究练习。
- 推荐阅读资料,以丰富每个讨论题目的信息。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信息。虽然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希望如此,但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包含关于文学解读与社会科学或卫生研究中应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关系的实质性讨论。我们也只是简略地讨论了那些和通常的视觉分析以及分析过程有关的话题。那些描述资料收集方法的章节不可能覆盖所有由研究行为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话题。一个排除所有其他的方法,只聚焦在特定方法上的研究不可能为每种方法提供足够的空间做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提高你从事质性研究的兴趣,质性研究不但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更能帮助你改造世界。我们相信,在健康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因为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研究方法能使我们获得知道什么能做的知识,以及在研究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合作的能力。

第 1 章 质性研究相关理论：传统与创新

理论总是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即,所做的、所观察的事情与其(系统的)解释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承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必然区别,但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Wiffiams,1976, p. 317)

理论是有用的;它让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直觉地、更好地理解我们已经了解的事物。不过,理论总是复合的、繁琐的,并且是多中心的……这就是社会学理论发挥作用的方式。它依赖于热心、激情、怀疑、宽容、耐心以及判断。(Beilharz,1991, p. 1)

应用于健康领域的质性研究理论是完整的。理论对了解和获得实证质性研究及其实践是有用的。本章论述了一些指导并影响质性研究的传统理论。传统理论与具体的卫生领域的实证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建设性的、强有力的互动由来已久。本章将继续就这一方面展开对话与辩论。

本章以回顾理论在实证质性研究中的角色开始。我们认为不同的研究项目在对理论的运用方式上是不同的,承认并接受这种理论应用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其余部分介绍了指导和影响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这些介绍本身并不充分,但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者思考什么理论最适合于他或者她的研究。每一部分介绍了在理论中的一到两个关键概念,从其他角度对比了这些理论,并且例举了短小案例说明这些理论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质性研究中存在大量的理论传统导向(Denzin,1997;Vidich and Lyman,1994)。我们选取了一些常用的并且在质性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如果这些理论没有一个符合你的具体研究,你还可能发现与你的研究更加相关的理论。我们讨论的理论传统包括:实证主义、民族志、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诠释学。

质性研究的首要问题

开展任何一项质性研究都需要首先澄清三组相互联系的问题:

- 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什么?
- 该研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 该研究的预期结果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逻辑上彼此紧密承接,而实践中,很多研究是从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开始展开的,在研究过程中再由此及彼。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而且都需要澄清,然而,哪个问题应优先考虑以及这三个问题该怎样回答取决于研究的目标。

道格拉斯·艾子关于失业人群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出自于对符号互动论和叙事理论的融合。该研究旨在用这一理论框架来促进叙事理论。在该研究中,失业人士对失去工作的实质性的叙述其实处于次要地位,而首要(理论)目标是形成叙事理论。

与之相反,在一项关于 HIV/艾滋病患者更换工作的研究中,研究的意图是为政府或社区部门提供信息以改善他们的服务(Ezzy et al.,1999)。工作更换的实质问题是该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选用的理论框架则是为了促成其达到研究目标的工具。那种强调潜意识力量的作用的理论,以及探查全球劳动力市场在艾滋病患者的工作经历中作用的理论,在此项研究中没有什么用处。然而,该研究发展了疾病、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同性恋文化的理论框架。当一种理论创新实现以后,这种理论就会被用来解决研究中更多的实际问题。

理论是对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观点的阐述。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不同的现象。例如,理性抉择理论就是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可用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个人理性抉择的结果。心理分析理论强调非理性以及无意识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符号互动理论则强调对象征性地产生的主体间的解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框架。所强调的是:总的理论框架从根本上造就了研究的重点,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所需要采用的方法和技术。

一定的理论框架只适用于一定的研究问题。一个强调社会生活具体表达性质的理论更适用于对女性乳房检查经历的研究,但对医生在医学期刊上发表关于乳房检查的新进展的研究方式就不那么适合。这并不是说这一理论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价值或没有意义,重要的是研究的实质性问题以及主要目标要与理论框架相匹配。

有时理论框架源于个人选择的研究惯例。例如,很多质性研究都声称在符号互动理论模式下进行扎根理论研究。然而,即使是符号互动理论也被分成若干理论派系(参见后面关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阐述)。

一些研究者可能更重视处理一些特殊的研究问题,例如,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越南女性乳房筛查的理解问题。如果质性研究不是建立在理论框架上,研究者就会在事实上采用特别的框架而不承认它。但是如果研究惯例已经建立了的话,这种做法就不会存在。很可能因为用于研究的一系列的技术路线已经建立而导致研究者用同一方法来寻求相似的答案。例如,文献中对澳大利亚越南和少数民族女性乳房检查方面的研究已经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只是用而不是检查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的做法会影响该研究的独到发现。

另一方面,一些人沉迷于理论。尽管理论在质性研究中的角色很重要,但理论任务的复杂性不应该阻挡研究者提出实证性的研究问题。继承早期质性研究者的符号互动论者和实证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复杂理论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或是寻求即使还不完善的解决方法来继续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者一旦确定了一种或几种理论承传、选择了研究的实质性焦点问题、明确了研究的预期结果,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仔细建构研究的方法路线。本章的其余部分更详尽地叙述了质性研究中理论导向的角色,并且简略阐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影响着质性研究,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与质性研究是对立的。它是一种包含很多与质性研究方法非常对立的理论概念的组合。在社会调查中,实证主义涉及一种信念,即社会科学是像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一样的科学。实证主义者总是更喜欢用量化研究方法来测量事物,喜欢使用结构化的问题和构建能用统

计学分析的标准。实证主义者喜欢结构主义式的解释,他们尽量避免对人类意愿和情感的解释性阐述(Giddens,1974; Maseide,1990; Mills,1959; Williams,1976)。

像物理学家一样,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者喜欢那种标准化的、可重复的,并能检验假说的方法。他们坚信这种方法能够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实证主义者试图消除或避免影响研究进程的诠释,目的是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例如,他们要求采访者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问同样的问题,要求在提问的时候不能带有任何个人情绪,并且访谈中要和被采访者保持距离[Bergen,1993; Prus,1996;还可以参见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特恩(Gubrium and Holstein,1997)以及希尔弗曼(Silverman,2001)关于“情绪化”与实证主义者的对立的讨论]。

质性研究者已经论证了用实证主义者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的中心议题是社会生活的意义和解释,人与事物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了理解人的行为,你必须理解人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Berger and Luckman,1967),质性研究的中心是理解意义和诠释。

民族志

民族志是一种包含了许多理论承传的方法学(第8章进一步阐述了民族志中的研究方法)。本部分的重点是将民族志中一个主要的理论承传的假设与其他质性研究中的理论承传相比较。在随后的第6章会更加系统地讲述健康和社会研究领域的民族志。该部分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审视民族志的理论承传。

相对于社会学研究,民族志与人类学研究的联系更加密切。实际上,民族志有时被看成是人类学家做的事情(Atkinson et al.,2001; Denzin,2003; Geertz,1973; Silverman,2001)。民族志在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的应用也逐渐普遍起来。不过,它经常被冠以不同的术语,如“社区调查(communities studies)”(Whyte,1955)。

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1973)是众多推崇在人类学中运用解释性民族志的最有影响的拥护者之一,我们将把重点放在他对民族志理论导向描述的分析上。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民族志包含多种理论承传,而格尔茨的解释性民族志理论只是其中之一(Rosaldo,1989)。格尔茨认为民族志不是用它采用的技术来定义的,如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而是由其特殊的智力活动定义的,他称这种智力活动为“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p.5)。深度描述注重的是细节和背景信息,它旨在通过描述人们行为的意义来解释他们的生活模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模式被理解和被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另一个描述这些意义模式的词是“文化”。格尔茨认为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且赋予人们行动的意义(p.12)。

民族志,至少格尔茨描述的解释性民族志,聚焦在一个群体的文化、网络和意义模式,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化,引导并解释人们的行为。民族志的研究目标是发现文化框架,分析它的结构和内容,并以此来解释特殊社会现象。根据格尔茨

(Geertz, 1973, p. 20) 的观点, 应该强调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被全面描述出来。民族志的研究总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猜想性解释 (Atkinson et al., 2001; Silverman, 2001)。

例如, 雷纳托·罗沙多 (Rosaldo, 1989) 在菲律宾对印度尼西亚人 Ilongots 部落进行猎人首领的研究。他学习他们的语言, 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 采访他们, 并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 目的是理解猎人首领的行为。Ilongots 部落经常告诉他“是失去亲人的愤怒促成男人成为猎人首领的”(p. 3) 这句话陈述得如此简单, 它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行为, 太“单薄”了。并且罗沙多当时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解释。然而, 当他妻子因为车祸去世时, 他开始“理解失去亲人时可能迸发的愤怒的力量”。罗沙多用“深度描述”来阐述了这一经历。他描述了“强烈的内在情绪状态”以及“由于悲伤引起的几乎不能忍受的深深的撕裂般的痛苦”。当他描述自己在失去亲人的经历时, 他才开始理解 Ilongots 人在经历丧亲之痛时情感的复杂与深沉。他详细地描述了丧亲时错综复杂的情愫, 并将其与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 从而产生了对“丧亲之痛”的深度描述, 进而解释了 Ilongots 部族猎人首领的行为。

罗沙多的研究对民族志产生了两点影响: 第一, 民族志的研究焦点是对意义和情绪系统的详尽描述, 以此而展示一种能解释特定行为的文化。第二, 研究者先前存在的理解、经历, 以及理论承传与他们在研究中的分析融为一体。如果, 罗沙多没有经历过丧亲之痛, 他就不可能对 Ilongots 男人成为猎人首领的丧亲之痛做出深度描述。研究者作为研究的主体的意义会在以后章节详细讨论。

“深度描述”的另一种理解就是“分析性的”或者“理论性”的描述, 就是说, 研究旨在对社会过程或者意义系统进行理论分析。“这种描述必须与特定事件的具体事实紧密联系, 同时揭露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Hammersley, 1992b, p. 12)。不过, 正如哈默斯利 (Hammersley, 1992b) 指出, 理论和描述相比, 前者要复杂得多。早期争论的焦点是理论与实证性的描述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近来, 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学者认为理论和描述是相互影响的 (Atkinson et al., 2001; Dough, 1992; Denzin, 1997, 2003; Fetterman, 1998; Jackson, 1989; Taylor, 2002)。

民族志作为从一种文化视角来诠释和呈现它的研究发现有其独特的一面。民族志尝试寻找意义及情感的模式并以此展示一种能解释某人群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的文化。民族志的核心是完好的或“深度”描述, 这要求研究者沉浸到一个团体或者是一种社会环境中去获得信息 (Van Maanen, 1982, p. 103)。民族志的理论承传经常运用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 (第 8 章)。焦点团体 (第 4 章) 以及深度访谈 (第 3 章) 通常是民族志的一部分, 并受它的理论承传的影响。

现象学

现象学理论对质性研究的影响大于以其作为指导理论的少数实证性质性研究

的影响(Jackson, 1996; Moustakas, 1994; Taylor, 1993)。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舒茨(Alfred Schutz, 1899-195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和其他人欧洲现象学研究者建立了对质性研究中许多常见理论和方法的哲学基础。在对“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的一个简短讨论以后,接下来的部分主要考察这些哲学家的一个中心概念,以此阐述其在质性研究中的意义。这些概念并不是,也不可能代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此,只是为了强调现象学哲学家的的重要性,指出在质性研究中所使用的现象学的来源,并鼓励进一步的研究。对现象学哲学家的详细分析参见麦坎(Macann, 1993)或者麦基(Mackie, 1985)的作品。对质性研究中使用的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的详细解说,参见贝克尔(Becker, 1992)或者穆斯塔凯斯(Moustakas, 1994)的作品。

贝克尔(1992, p. 7)对现象学家的描述简洁而清晰:“现象学家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形的。”与强调文化特性的民族志相对,现象学强调个人“生活世界”的构建。“总体而言,人们全部的主观经历的生物世界也属于‘生活世界’。”(Ainlay, 1986, p. 43)生活世界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世界,它包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如:应该穿什么衣服,天气如何,与朋友打招呼的方式,书写时是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怎样处理尴尬的事件。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如果放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意图的概念是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伯杰和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p. 34)指出的:“意识总是有所指向的;它总是指向某个目标或者说是被引向某个目标。”这句哲学陈述对研究人类行为有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做某件事的目的,我们必须先理解其行为的意义。意图的现象学概念很早就对研究人类行为意义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艾尔弗雷德·舒茨强调社会学有必要详尽地研究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因为这个焦点跳过了很多哲学问题并引导舒茨去调查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化(typification)”(Berger and Luckman, 1967, p. 97)。典型化指的是人们在互动中所形成的分类体系。在英语国家舒茨现象学最杰出的代表是彼得·伯杰和托马斯·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 1967)。他们强调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历的调查,以及理解人们在互动中使用的典型化或分类体系,为合理的实证性的质性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背景。

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用德语“Dasein”来指代人。他的目的是强调在世界上人是具有生命存在的属性。以此反对笛卡尔哲学中将人视为孤立的自我意识的理论。Dasein 字面意思是“在那里有生命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存在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并与其他人分担社会实践。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始于独立的或孤立的个体。海德格尔反对这个观点,并以“在那里有生命存在”来强调他的

反对。“把人与世界分离是错误的;人是作为生活在世界中而存在的”(Becker, 1992, p. 13)。尽管当前一些质性研究体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他的思想内涵还是在继续地被融入实证性质性研究的实践中。海德格尔哲学创新的全面影响体现在质性研究方法中大量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创新的发展上,这些方法将在随后的章节给予介绍。

与现象学哲学家相伴随,实证性现象学的研究惯例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该惯例主要是描述日常生活经历或个人的“生活世界”的本质。以现象学为导向的研究者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目标是决定一个经历对当事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当事者如何全面描述该经历”(Moustakas, 1994, p. 13)。

科林和劳宗(Corin and Lauzon, 1992)曾运用现象学理论研究社区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他们发现精神病学没有系统地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义构建。该研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开放式访谈,旨在理解“康复策略以及与其社区生活的能力相关的生活形式”(p. 266)。传统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结果是从社区生活中退出,如表现为不积极,缺乏参与意识,这是消极预后的提示(an indicator of a negative prognosis)。相反,在访谈的基础上,科林和劳宗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理解这种退出,觉得退出是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策略,它避免了二次入院。“这种策略的特点是远离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同时结合各种与社会环境保持更少联系的策略”。这项研究说明了使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以参与者的视角研究事件的有用性和重要性。

现象学家的焦点是生命世界的社会建构,强调只有将人们的行为置于其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常规中去,其行为才能被理解。另外,现象学家强调在解释人的行为时应参考他们的意图,以及他们后天形成的典型化或者是理解的类别。现象学研究经常采用深度访谈(第 3 章)。总地来说,现象学理论对于大多数的质性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质性研究方法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阐述。

符号互动论

不同于聚焦于现象学以及起源于人种学的民族志的欧洲哲学,符号互动论源于美国的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运用一系列普通的符号来解释其经历。符号互动论强调符号是发展的,是通过互动的过程而发现意义的。尽管早期的互动论者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互动论已演变为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的特征。

有证据证明,最杰出的符号互动论者是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当米德的思想尚在孕育之中时,心理行为主义者认为,即使可能存在思想和意义,用它们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而行为主义者则认为只有通过行为观察才能解释行为。与这两者相反,米德(Mead, 1934)认为意义和符号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人的行为是由所遇到的客体的意义所引导出

来的,这点在托马斯(Thomas,1928,p.584)的那句格言中得到了最好的阐述“如果人们认为一种情形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形中的人们也是真实的”。

当米德把自我形容成本身的一个客体的时候,他将符号分析更加深入了一步。当一个人通过角色互换来想象他自己在其他人眼里是什么样子时,他的自我就对他本人而言产生了一个符号性的客体(Mead,1934,p.137)。通过角色转换,人们能够在自己行为意义的基础上对自我做出回应。赫伯特·布卢默(Blumer,1969)扩展了米德的理论,强调意义“内化”的本质。意义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创造,再创造以及修改,是飞跃式的。这种自我概念与笛卡尔哲学所推崇的固定的自我实体不同。“自我不是一个给定的固定实体,不是在各种情景中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被不断地、有意识地创造和再创造,并通过记忆的绳索连接在一起。”(Berger,1975,p.124)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符号互动论一直被广泛应用。70年代以后,符号互动论的运用不是那么普遍,但是当前又经历了复苏,并得到了诺曼·登津(Denzin,1989a,1997)的支持。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符号互动论学者,包括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埃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及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im Strauss)。他们都在健康及相关领域开展过研究,包括对实习医生(Strauss et al.,1961)、精神病患者(Goffman,1961)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健康及相关领域的实证性研究(Maines,1991b)。

戈弗曼对精神病患者拘留过程的描述清晰地阐明了社会关系在自我概念塑造上的强有力的作用。戈弗曼描述了病人在被拘留的各个阶段,伴随着社会角色的减退,直到不但没有了与亲属、医生和朋友的互动,而且与物理环境也没有任何的互动。这些都向病人提示他们已经是一个无法生活的自我。环境的改变以及其他人对待病人的方式能够改变病人的自我概念,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想自己有精神疾病,尽管他们以前从未那么想过。病人一旦住院,就会被要求参加“忏悔”,单独的或者是集体的心理治疗。而在治疗时他们必须接受或不得不接受医院对他们的看法(Goffman,1961,p.143)。医院需要病人承认他们有精神疾病,因为只有这样医院才能成为“好转”的场所。

符号互动论学者认为只有当经历在互动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时候,经历才会有意义。他们研究了互动的来源,共享的符号系统的发展,并以此来解释与其有关的行为。符号互动论对质性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扎根理论的发展。扎根理论在下一章节将详细阐述。符号互动论运用了一些典型的方法,如深度访谈(第3章)、焦点团体(第4章)、非干预性方法(第5章)以及民族志(第8章)。

女性主义

我们并非要在这一部分对女性主义思想做总的概括(Clough,1994;Coffins,

1991; Kitzinger, 2004),而是要从三个方面就女性主义思想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影响做一个回顾。首先,女性主义思想已经在倡议研究方法的价值和合理性、检查被研究者的经历和主观性方面促进了质性研究。其次,女性主义思想使研究过程政治化。从反对质性研究的客观性着手,女性主义者已经示范了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完整政治性和伦理性,包括研究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最后,女性主义者探索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要经历的反思的属性,从而强调了研究者作为研究过程中不可分割部分的重要性。虽然这些质性研究方法早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加快了质性研究者对这些观点的接受并更深刻地检查了它们的含意。

登津(Denzin, 1997, p. xiii)认为,人种学是带性别色彩的。质性研究不可能形成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中性故事。正如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 1987, p. 152)指出,“直到最近,人们一直在广泛争论,已建立的社会学有一个隐藏的性别分支,即社会学大部分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思考、研究和书写的”。史密斯指出,这种女性主义者的批判有两个焦点。首先,女性主义者强调了在研究题目及研究报告中缺少妇女。“然而,在批判中第二个主题是质疑已经建立的社会学方法。”他指出,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客体化了社会进程,它将人作为被动者而非积极构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动者来对待。社会学重视组织过程、概念及变量,但忽视了“自然世界的现实存在”,尤其忽视了社会团体中不可缺少的妇女部分,对女性的角色和行为视而不见,并忽视或淡化了由妇女所从事的活动及角色,而这些活动及角色是使社会组织完整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Smith, 1987, p. 153)。

桑兹(Sands, 1996, p. 167)在说到女性主义时,简要地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文学使一个沉默的、无发言权的‘另类’妇女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实证主义的方法学自称是客观的,但它却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构建、进行研究和分析。和它相对,女性主义理论学家们提倡那些能让妇女从自己的角度表达她们经历的研究方法。“为了拓展我们作为妇女对有关自己的真实事情的理解,我们需要以妇女作为主体的研究方法”(Smith, 1987, p. 153)。因此,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初学者来说,以释意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女性主义对促进质性研究的发展很重要,近年来,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的研究可以既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这取决于研究所涉及的问题(Jayaratne and Abibail, 1991)。

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并不是仅仅呼吁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新的关注“妇女”的话题,或引入更具解释性和质性的方法,她们也很重视社会生活在政治及社会进程中的角色作用,这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是一致的。简言之,她们指出,大多数的社会研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是为男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见 Hughes, 2002; Jarviluoma et al., 2004; Kitzinger, 2004; Reinhartz, 1992)。

例如,多萝西·史密斯(Smith, 1987, p. 154),是不折不扣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人,她认为,女性主义社会研究是一种“意识觉醒”形式,它试图证实个人的压迫经历是可以理解为构成妇女经历的整个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在这里,史密斯响应了

迈尔斯(C. W. Mills, 1959)著名的关于私人问题与公共话题间有明显区别的观点,然而,她在具体的女性主义的论述上比迈尔斯前进了一步。她认为,许多妇女的私人问题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公共问题,是因为已建立的社会学方法普遍地忽视了每日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妇女的生活。伯根(Bergen, 1993, p. 202)提出相似的观点,她认为,“为了研究参与者,也考虑到研究的结果(从个人层面以及政治含义角度),女性主义者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她们的目标是全体妇女的解放”。米斯(Mies, 1991, p. 63)将这一说法发展了一步,认为女性主义者研究方法的座右铭是:“为了理解一件事情,你必须去改变它。”

史密斯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她坚持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为实证主义提供了一个更确切、更科学的说明。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克拉夫(Clough, 1994, p. 74)批评史密斯,说她“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分析,即以文字记录为中介的话题是如何与无意识的渴望、主观主义,及经历的存在记录相联系的。”不管怎样,史密斯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举例说明了女性主义思想对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显著影响。她侧重于研究过程的政治层面,也侧重于试图从被研究者的立场理解经历的方法学。女性主义研究者,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强调这种观点的反身性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Clough, 1992; Sands, 1996)。这一话题在访谈方法一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拉克尔·伯根(Bergen, 1993)运用了女性主义理论来研究遭婚内强奸的幸存者。她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她说,女性主义不仅影响了她对话题的选择,也影响了她进行访谈的方式。伯根反对传统的访谈者那种有距离感、情感中性及缺乏兴趣的角色,她变得“有意识地偏袒(consciously partial)”。在这种意识下,她尽力制造互动,讨论自己的经历,她试图在“个人水平(personal level)”上使访谈具有互动性。特别是,当她的访谈对象因复述过去的经历而感到烦恼伤心时,她没有试图保持超然和“客观”,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提供支持安慰”(p. 208)。她认为这种方式给了她很重要的启示,不采用这种方式,她就会错过这些启示。伯根认为,这种有意识地偏袒与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与研究主体建立“非剥削性的关系(non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s)”。

女性主义对质性研究影响重大(Hughes, 2002; Kitzinger, 2004)。女性主义者促进了质性研究作为正统研究方法的建立。此外,她们还强调了所有社会研究具有的政治性和自反性。女性主义的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本书中描述的所有方法(Hughes, 2002; Kitzinger, 2004; Olesen, 2000; Reinharz, 1992; Taylor, 1998)。运用回忆(第7章)和参与行动研究(第9章),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利用女性主义的理论,而非其他传统的惯例。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解构主义是指一系列对社会科学和人文

主义有广泛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Alvesson and Skoldberg, 2000; Grbich, 2004; Harvey, 1989; Lemert, 1997; Lucy, 1997)。虽然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章晦涩难懂,但我们相信它们予以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我们这番努力的。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很多的与质性研究方法有关的主题,包括有关主观性本质的争论,我们将讨论限定于一些以后现代主义方式,对质性研究有影响的实例,讨论将聚焦在对“现实”的本质的争论上。

后现代主义的含意及其与质性研究相关的理论仍在继续发展中,并常常和强烈的情感表达相联系 (Richardson, 1997, p. 127), 登津和林肯在《定性研究(全 4 卷)》(2000a)的书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看法。斯诺和莫里尔 (Snow and Morrill, 1995, p. 341) 批评了这本书的第 1 版,说它“特权化了后现代主义观点”,指出后现代主义对质性研究的作用依然有待于验证。作为回应,登津和林肯 (Denzin and Lincoln, 1995, p. 352) 指出创新是质性研究的核心:“质性研究方法开放性结尾的特性使它一直抵制强加在研究过程中的单个伞状范式 (umbrella-like paradigm)。”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作者要选择性地使用,以支持质性研究者的不同实践。斯诺和莫里尔支持质性研究的传统价值和尝试—证实方法 (tried-and-proved methods), 而登津和林肯则拥护后现代主义质性研究的创新和尝试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者的首要假设之一是简单总结或者处方 (扎根叙事) 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世界。他们赞同描述复杂的、充满对抗或者矛盾的世界。因此,简单总结的理论假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它很难简单地总结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然而,阐明一些指导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中心假设还是可能的。

诺曼·登津 (Denzin, 1997, p. xiii) 赞同“通过我们的写作和工作,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被创造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登津指现实不存在而仅仅书本和解释存在吗? 一些质性研究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极端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形式 (Faberman, 1992; Prus, 1996)。然而,法伯曼 (Faberman) 和普拉斯 (Prus) 显然是误解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话。法伯曼和普拉斯可能已将后现代主义释义为争论现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解释之外的,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者,像登津,拒绝接受这种两难选择。据我们的理解,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不是否认现实的存在,而是指出虽然现实已经存在,但它是在谈话和写作中被构建出来的。然而,我们得承认,在后现代主义者中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显然是会遭到法伯曼和普拉斯批判的那种怀疑主义相对论,而其他人明显没有。

后现代主义分析的“现实”很难理解,部分原因是很多后现代主义者们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然而,它们确实也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使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在谈论质性研究,这种视角的不同是很难理解的。接下来我们将检验几段一位后现代主义者的话,并尽力去翻译和重新解读文本的意思。

特林 (Trinh) 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她在现代电影分析中曾经批判过现代民族志

(Denzin, 1997)。下面这段话摘录自她的著作《当月亮涂上红色蜡烛》(*When the Moon Waxes Red*, 1991)。她的思想远比这段短小的摘引要复杂得多,但是这里也能显示一些她的核心观点:

质疑一种文化的所有分支的任务保持不变,就像是当事物一旦具有了一个合适的名字的时刻,它才能定位和过渡。任何权力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主动统一世界的体现。要挑战治理一个社会的政权制度就是构思政治如何改变现实,而不仅仅只作意识形态的解释。(Trinh, 1991, p. 2)

The task of inquiring into all the divisions of a culture remains exacting, for the moments when things take on a proper name can only be positional, hence transitional. The function of any ideology in power is to represent the world positively unified. To challenge the regimes of representation that govern a society is to conceive of how politics can transform reality rather than merely ideologize it. (Trinh, 1991, p. 2)

这些不容易看透的引文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来检验第一句话。使后现代主义方法具有威胁、产生热烈讨论的原因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并不是简单地争辩一种特定的理论的不同的方式和它的用处,而是争辩研究和理论用于实践的根本转变。“定位,然后过渡”表明特林的后现代主义方式。这意味着事物(包括疾病、医生,或者月亮)本来没有定义、没有意思,或者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名字”。它们的重要意义取决于为它们命名的这个人的身份,为此,它们的重要意义可以随着给它们命名的人的身份变化而变化。

正如登津(Denzin, 1989b, p. 74)所说,特林“寻求揭开全部现实主义民族志项目”。在后现实主义中,诸如真理、现实和事实都有着不同的意思。它们不再涉及人们对事物的惯常理解,它们指的是社会进程中构成事实、真理和现实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特林不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合情的,或者是没有判断标准的。她建议所有的文化研究(包括民族志和其他质性研究)是苛求的或严格的。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不能避免使质性研究具有价值的严谨的问题(见第2章)。

上面这段引文的章节还讲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故事。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特林根据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从不同的社会地域对月亮的观察,回顾了月亮意义的改变。例如,亚洲人将中秋节的圆月和街舞、食物,及音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庆祝“女性的美丽和恋爱中的女性的展示”(Trinh, 1991, p. 3)。不管怎样,这些对月亮相同的庆祝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月亮也曾经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诬蔑成是反革命的封建思想象征。特林指出,在有些文化里,月亮的颜色如何变化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灾难,但是,现在已经被科学家们去除了它神秘的面纱,弄清楚了它的本来面目,科学家们甚至还发现了月亮“不容置疑的可爱(undeniably lovely)”(p. 8)。

特林也指出对月亮的理解方式反映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和世界观。中国在文化

大革命时期对中秋节的压制和当时政治意图相一致,他们试图抹去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文化所受到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我们理解特林把“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当局的压制”理解为那些更为普通意义上的文化实践,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拒绝任何有关封建主义的事物。世界被“主动地统一”,可用月亮被迫与哪些普遍的文化实践相一致的例子来说明。中秋节不为文化大革命所容就是因为它没有和当权者远离封建主义的愿望相一致。

在她最后一句话里,特林说到“要挑战治理一个社会的政权制度就是构思政治如何改变现实而不仅仅只作意识形态的解释”。特林不是简单地以一种特定的文化组成去交换另外一种,她是想“挑战”社会和文化的组成和使用形式。她想人们认识到描绘事物的方式(包括月亮、疾病和医生们)是政治行为,是能反映和改变事物的属性的,包括社会团体的属性。特林以《当月亮涂上红色蜡烛》为书的题目反映出她借用五颜六色的月亮来想象即将发生的灾难,她认为社会正被引向灾难,或者至少处于危机之中。就如人们对月亮的理解一样,这种危机出于没有正确地理解世界。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找出正确的方式理解月亮,或者,更普遍意义上说,我们也不能奢望找到一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最终方案。相反,后现代主义,如特林,建议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和只有利于部分人,而不利其他人的。简言之,她认为质性研究应该释义而非假装已经有了最终的和正确的答案。

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67)在对精神病的研究中举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对健康问题的研究。福柯作品的中心观点之一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精神病的治疗就强调逻辑和推理(Samson,1995)。真理就被理解成是通过逻辑推理而发现的。缺乏逻辑推理的思想、观点以及没有逻辑推理的人因此而被诋毁,只能在就真理的争辩中保持沉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精神病人可自由自在地闲逛,他们并不会被社会所抛弃。启蒙运动之后,精神病人被认为是容易被激惹的,因此被关进了疯人院和与社会隔离开来。换句话说,开始于18世纪的让精神病人镇静和禁闭在疯人院的做法是后启蒙运动的特殊产物,任何人和事物只要是被认为不会进行逻辑和推理就被迫保持沉默和受压制。肯德尔和威克姆(Kendall and Wickham,2004)在他们最近的著作中用到了福柯式的理论框架。

在质性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起了很多争论(Alvesson and Skoldberg,2000;Gribich,2004)。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之一就是具体理解和解释,它反映出更多的文化模式并将政治整合其中。再则,解释和意义上的文化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权力所驱使的利益影响下不断地变化和转换。后现代主义质性研究者们尝试着让其对这些情况的和政治本质的特别分析被承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应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他们倾向于应用非干预性的方法(第5章),他们通常注重对已有资料进行再次分析,或者注重进行历史分析。参与行动研究(第9